

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再反思

成威华

【提要】 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关注历史书写,认为历史文本是一种言辞虚构,历史叙事没有真假对错,这一观点遭到了学界激烈的批判。本文首先对这些批评与后现代主义的自我辩护进行梳理,然后对海登·怀特与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理论变化和差异进行辨别,最后在此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重新评价。虽然后现代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怀特与安克斯密特在理论观点上存在前后变化和内部差异,而且就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也或多或少作过区分,但他们忽略了对历史研究环节的考察,否定了历史叙事存在“真”的可能性,最终陷入了历史相对主义的泥沼,观点甚至前后自相矛盾。与后现代主义这一叙事唯心论相比,学界目前需要一种同历史研究更相契合的叙事实在论。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自我辩护 内部差异 重新评价

1984年,面对历史学不断加剧的相对主义趋势,有人就此征求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意见,布罗代尔答道:“历史学家在写小说?那是开玩笑。历史是件严肃的事,那种批评已经过时。费弗尔与米什莱的不同之处在于,费弗尔只是没有放弃他的激情或者他的想象力而已。”^①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布罗代尔口中所谓过时的观点不仅没有消散,反而给历史学界造成了极大的理论困扰,且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奠基人怀特看来,历史想象正是史学类似于文学的证据。后现代主义提出历史的虚构性问题后来遭到了严厉批判,甚至是漫画化解读,而后现代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怀特与安克斯密特也就这些批判作过必要回应和自我辩护。那么,后现代主义究竟是否属于历史相对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到底能否区分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我们又应如何评价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本文首先对后现代主义面临的批判与自我辩护进行梳理厘清,其次对怀特与安克斯密特理论观点的前后变化和彼此差异进行辨别探讨,最后对后现代主义进行重新评价。

一、后现代主义面临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历史是史家构建的产物,历史文本归根结底是一种言辞结构,而过去属于混沌,其本身并不具有叙事的结构特征。因此,历史与过去并不存在对应的指涉关系,历史不等于过去。就同一个过去而言,不同历史学家由不同的叙事策略和叙事视角出发呈现的历史往往千差万别,这些不同的历史叙事或历史再现只有优劣之分而无真假可言,因此,历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弗朗索瓦·埃瓦尔德、让-雅克·布罗希尔:《史学一生:布罗代尔访谈录》,赖建诚编:《年鉴学派管窥》,左岸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引文经过轻微调整。

史需要不断地进行重新书写。对于后现代主义否认历史真实这一点,学者们提出很多批评,其中甚至不乏意气之争。批判者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论证不是存在根本错误,就是有意夸大,这些思虑不周的做法严重忽视了史学的特殊性。本着交流对话的目的,本文将那些争强好胜式的过激言论予以摒除,并在此基础上将批判大致归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语言学转向的理论前提问题。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认为,历史学家使用的是日常有教养的语言,而该语言是不透明的,因而历史学家通过这一中介根本无法真正地触及历史实在。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现代主义与其批评的对象也许同时共享一个理论前提。坚持史学是科学的实证主义者就认为,修饰性语言不包含关于实在的信息,并禁止使用它们。由此来看,二者采取的是在字面的平实语言和形象的比喻语言之间的二分。借用克里斯·洛伦茨(Chris Lorenz)的话说,后现代主义是在反对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这两种实证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而来,但它却认可了其批判对象秉持的在平实语言与形象语言之间的二分,认可了这种或然逻辑(either-or logic)。针对这种修饰性形象语言,二者态度截然相反,因此,后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倒置的实证主义。^①具体而论,怀特在将修辞学和诗学理论观点挪用到史学时,要么涉及学科领域的转换,要么没有恪守史学与文学界限的既定规则,他至少未对这种拓展性的使用作出必要说明;^②安克斯密特在借用单子概念类比叙事实体或历史再现时,直接肯定了它们的彼此独立,否定了它们之间存在“窗户”的可能性,叙事实体或历史再现的“预定和谐”由它们的共同名称实现。^③总之,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问题在于,它要么坚持了它反对观点的理论前提,要么对其他学科既定理论原则进行了不恰当的挪用。

其次,忽视历史研究实践,导致结论以偏概全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在事实和解释两个层面对实证主义进行了双重颠倒,它在历史证据和历史解释问题上与实证主义的观点正好截然相反。它关注历史书写问题,聚焦历史文本的叙事性和虚构性,却忽视历史研究实践,丝毫不涉及历史证据和历史解释。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就批评怀特,在研究兰克的时候几乎完全忽视了兰克倚重的档案研究。而且,怀特对具体史学作品的分析,要么没有选择那些叙事性很强的作品,要么没有落实到具体内容。这些解读与其说是文本分析,不如说是作者意图的语境分析,因而他的解读与其理论观点存在脱节现象。此外,怀特的解读还存在忽视文本丰富性的情况。就每个史家而言,作品的比喻和风格可能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怀特的解读更多是透过理论观看的结果,而不是文本自身固有的。^④关于历史解释,怀特将其看作是比喻的延伸,但比喻性解释或情节化解释很难说是对论点的成功证明。洛伦茨就对此提出质疑:“那些认为自己的隐喻和明喻提供了事物解释的

① David Carr, *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 Chris Lorenz, “Can Histories Be True? Narrativism, Positivism, and the ‘Metaphorical Tur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7, No. 3, 1998, pp. 312 – 320; 克里斯·洛伦茨:《跨界:历史与哲学之间》,高思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100页。

② Roger Chartier,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s*, trans. Lydia G. Cochran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2 – 33;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 I,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163.

③ 单子是德国学者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原子无论多么微小,只要具备广延性就是可分的,也就意味着其不是最终实体,于是他创造了单子概念。他提出单子既不属于物理学,也不属于数学,而是形而上学,它构成事物的绝对的最初本原。单子是封闭孤立的,彼此各不相同,但又由上帝的“预定和谐”保证了它们的一致。安克斯密特借用莱布尼兹对单子的规定表明,叙事实体或者历史再现是独立闭合的,它们彼此间不可比较,无法通约。

④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Between Scholarship and Poetry: Reflections on Hayden White’s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Rethinking History*, Vol. 4, No. 3, 2000, pp. 378 – 379.

作者,实际上只是提供了回避解释的证据。因为,当欧洲激增的人口被比作膨胀的星系,或者某个乡村的社会结构被描述为磁场的时候,任何史家都不应认为他已经证明了其论点。”^①另一位代表人物安克斯密特更是对历史的因果解释予以了彻底的否认。

最后,历史相对主义问题。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认为,历史叙事作为史料解读与意义构建的结合,本质是一种言辞虚构,在内容上既是发现的,也是发明的,在形式上更接近文学。^②对不同的历史叙事而言,历史文献没有任何依据让人们去偏爱其中的某一种,^③而美学或道德就成为最终的判断依据。换句话说,它们作为不可通约的莱布尼兹式单子,只有优劣之分而无对错之别,要战胜某个叙事性解释只能提出一个更优解释。^④伊格尔斯认为,历史与虚构确实存在延续性,二者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和界定,而且史学也确实存在不同观点相互争论而无法最终确定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完全是虚构的而不再受“真”的约束制约,也不意味着所有历史叙事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就是等价的。文献证据仍能成为检验历史解释的依据,通过史学通行的规则,也可以就某些问题达成某种共识。^⑤洛伦茨认为,后现代主义将历史与实在的指涉关系仅归结于历史研究和陈述层面是不恰当的,单个陈述与作为文本整体的叙事只有程度而非类型的差别,指涉的不确定性不能成为否定语言指涉性质的依据,否则陈述也不存在所谓的指涉关系。史学作为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经验学科,需要面对史家群体甚至是公众的审视和辩驳,由此完全可以得到检验。“真”的复杂性不能成为反对它的理由。历史叙事与虚构仍然存在差别,因此,需要一种以真假为前提且与历史研究更相契合的历史哲学。^⑥

二、后现代主义的自我辩护

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遭到学界的各种批判,但对两位代表人物而言,这全然是因为对方仍然停留在史学研究现代主义范式的结果。面对那些激进的、漫画化的解读和误解,怀特指出,批判者们将他们所有不喜欢的人归为一类,要么进行智力上的贬低,要么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更确切地说,是谩骂和诽谤。很多批评没有建立在真正阅读后现代主义作品的基础上,因而批判者们在反对修辞的同时却在使用修辞进行攻击。^⑦安克斯密特也抱怨,“经验主义历史哲学家是极其难以取悦的对手,即便你同意他,也不能指望他高兴,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会用一句牢骚轻易地将你否定。”^⑧此外,将他与怀特等同看待也使之极其为难。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将文学理论作为工具引入史学,虽然对史家理解历史书写有所助益,但同时也是危险的,怀特的理论只是一种帮助分析史学

① Chris Lorenz, “Can Histories Be True? Narrativism, Positivism, and the ‘Metaphorical Turn’”, p. 320; 克里斯·洛伦茨:《跨界:历史与哲学之间》,第100页。

②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

③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董立河译,天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④ 安克斯密特:《答扎格林教授》,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203页。

⑤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Between Scholarship and Poetry: Reflections on Hayden White’s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pp. 382 – 388.

⑥ Chris Lorenz, “Can Histories Be True? Narrativism, Positivism, and the ‘Metaphorical Turn’”, pp. 324 – 329; 克里斯·洛伦茨:《跨界:历史与哲学之间》,第103—109页。

⑦ 海登·怀特:《答亚瑟·马维克》,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81页。

⑧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2.

作品的历史著作理论或史学史理论,它与史学理论关注的认识论问题毫不相干,没有且不能告诉史家是如何成功再现过去的。叙事主义不应与“讲故事”联系在一起。^① 历史与虚构的混淆问题确实更多是由怀特引发的,怀特后来也承认,对历史话语的理解需要语言哲学理论的辅助。考虑到后现代主义两位代表人物观点的差异,本文先就怀特的回应进行简单概述,再对安克斯密特的反驳进行梳理。

怀特指出,历史事件是经过史家或抑制或凸显后才成为历史故事的,历史叙事在编码和重新编码过程中将情节化、形式论证与意识形态蕴涵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编码方式又是由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决定的,可以区分为隐喻、转喻、提喻与反讽四种比喻类型。历史故事具有开头、中间、结尾的融贯闭合特征或诗学性质,它有别于历史实在,从而属于虚构。针对史家们提出的批判性问题,首先,怀特认为《元史学》(*Metahistory*)是几十年前结构主义盛行时期的产物,他的关注点确实只是历史作为言辞制品的形式,而非叙事的分析,当时普遍认为叙事是相对于法则解释的另一种解释形式。导论和结论是最后才完成的,是对自己具体研究工作的理论反思和修正。但是,怀特无意就此进行辩解或致歉,他的目的是对先前历史与虚构严格区分的看法发起挑战并进行革新。当然,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辩,他现在更倾向于将历史书写称为文学(literary)而非虚构。关于文本风格虚假的一致性,怀特认为话语的一致性存在多种逻辑,“同一”只是其中一个标准。其次,至于历史研究的过程,怀特认为,它是“学识学术的剧场”(theater of the scholarship of erudition),具有仪式性的功能,没有它,史学将失去其主张的可信和客观性。最后,这种相对主义在怀特看来,并非任意的言说和书写,相反是与人文科学相对应的一贯态度,它并不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大屠杀的修正主义其实一点也不激进,它只是否定了晚近发生的事件,其研究和批判的方法论基础仍属于传统史学范式。之所以要反对它,不仅是因为它是一种妄想,还因为它会给后辈带来恶劣影响。^② 借鉴文学理论的怀特如此自我辩护,而借鉴语言哲学的安克斯密特的辩护是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的。

第一,语言学转向创新问题。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某种实证主义观点的反叛。史学是经验主义的,先前的现代主义或认识论的史学理论也是经验主义的,它们试图尽可能地将语言与过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直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将语言与世界、词与物的关系纳入视野后,历史哲学才真正舒展自己的双翼,成为一种历史解释哲学。真正的对立并非主观与客观的对立,而是本真性(authenticity)与经过叙事散文的语言编码的实在的对立。^③ 换言之,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真正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回应的并非是经验强制而是语言强制(compulsion of language)问题。兰克所谓的“如实直书”其实是一种天真的实在论,因为历史语言并不透明。借用安克斯密特的话说,它不是“玻璃镇纸”而是“观景楼”,“我们不是透过历史学家的语言,而是从它所提出的视角来看过去

①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 74; 安克斯密特:《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112页。

② Hayden White, “An Old Question Raised Again: Is Historiography Art or Science? (Response to Iggers)”, *Rethinking History*, Vol. 4, No. 3, 2000, pp. 391-406; 海登·怀特:《敬答复伊格斯教授》,方志强译,《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 Hayden White, “A Rejoinder: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Chartier’s Four Questions”,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Vol. 27, 1995, pp. 65-67.

③ 安克斯密特:《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123页;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5页。

的”。^① 我们拥有的只有文本,只能在不同文本间进行比较,而历史解释的自我增殖,一方面会遮蔽我们对过往的观察,另一方面会要求我们关注不同叙事实体或历史再现的差异。不同叙事实体因共同的名称而共同塑造叙事实体的同一性(identity),因此,叙事实体的同一性永远不会清晰明确,它始终处于叙事实体与无穷叙事实体这两个极端间。^②

第二,历史研究存在的“忽视”问题。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被认为是倒置的实证主义,因为它与天真的实在论秉持共同的理论前提,但这种指责在安克斯密特看来颇为困惑。后现代主义关注的是语言与过去实在的关系,而经验主义关注的是证据与实在的关系。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忽视了证据问题,他承认确实如此,但这种批评不具有任何建设性。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理论关注点的转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那他就不能同意了,因为这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除非能够证明证据规定了历史再现的内容,使“证据和再现层面可以完全融合”,而这一点任何人都不会承认。^③ 至于历史研究问题,安克斯密特表示,他本人无意轻视,当前叙事主义的流行与历史研究的贬抑不存在必然联系,这是史学理论发展的结果,叙事主义也不是要对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进行简单的二选一,它只是希望纠正先前那种令人遗憾的片面性。因此,它只是补充而非取代,批判者们的或然逻辑是对后现代主义的误解。^④

第三,历史相对主义问题。通常认为,历史学包括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两个层面,相应地,史学的“真”也包括经验层面(言说)的综合真理,以及意义层面(言说的言说)的分析真理。但是,这些划分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属于经验主义的教条,二者并不能截然区分,因而真理信仰的源头到底是经验还是语言,这根本无法确定。如果企图通过牺牲经验强制或语言强制一方来摆脱这一困境,就意味着要么“历史书写终结”,要么丧失“更好地理解所处社会的必要工具”。^⑤ 语言学转向从来不是“对真理的攻击或者相对主义的通行证”,它同样适用于科学领域,只是由于科学更专注于指涉而非意义,所以经验强制大于语言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就从真理视角出发否定了史学。相反,如果像经验主义批判者们那样,时刻对语言学转向的相对主义意涵保持警惕,那么语言强制将不会留有任何余地,历史语言的使用也将受到极大限制,这无疑是对史学健康良好发展的致命一击。^⑥

如果说历史语言包括陈述和文本两个不同层面,那么,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关注的是作为叙事整体的文本,指涉对象与述谓属性在这一层面相互融合、难以区分,属于描述与再现的原则性区别,描述可以指涉实在,而再现只是关于(be about)实在。经过语义提升(semantic ascent)言说与“言说的言说”结合后,形成的文本会产生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为历史研究打开一个逻辑空间,从而使历史思考和历史讨论得以不断延续。^⑦ 在这些历史争论中,历史实在本身已无法为我们提供再现标准,真假“不再是仲裁人而是赌注(stake)”。^⑧ 经验综合与演绎分析两个层面的真理,均可通

① 安克斯密特:《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131—132页。

② 安克斯密特:《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138—139页;安克斯密特:《答扎格林教授》,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193页。

③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 51.

④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 53—54.

⑤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 31—34.

⑥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 36—38.

⑦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 39—41.

⑧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 35.

过概念定义的修改得到保证。这就类似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最终可通过重新定义鸡或重新定义蛋来解决。但是,这说明真理不是唯一、最终的标准,它只是起点而非终点。经验主义者如果过分强调历史再现的指涉性,而最终又无法将语言强制完全还原为经验强制的话,就会挤压历史语言带来的不确定性,造成“历史理解的枯萎与科学的胜出”。^①因此,相对主义其实是实证主义的变种,如果没有实证主义念头,相对主义也就不是问题。经验主义批判者与后现代主义者的共同点比他们乐意承认的要多,与其说后现代主义是颠倒的实证主义,不如说实证主义是颠倒的叙事主义。^②

三、后现代主义的前后变化与内部差异

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两位代表人物认为,他们与批评者的观点存在研究范式上的差异。安克斯密特提出,即便是以现代主义的理论预设为起点,借助现代主义的推理方式同样可以得出后现代主义的结论。^③然而,他没能看到的是,由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预设出发,同样可得出所谓现代主义的结论,或由后现代主义的叙事范式出发,同样可得出非后现代主义的结论。尤尼-马蒂·库克楠(Jouni-Matti Kuukkanen)将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划分为语言学叙事主义和现象学叙事主义两个分支,前者代表人物有怀特与安克斯密特,后者代表人物有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与大卫·卡尔(David Carr)。^④就历史叙事是否指涉历史实在,或历史叙事是否存在真假对错而言,这两大分支的观点存在后现代主义与非后现代主义的区别,或是叙事唯心论与叙事实在论的对立。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现象学分支在很多问题上就不一定得出与语言学分支相同的结论。即便在语言学分支或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内部,两位代表人物怀特与安克斯密特也存在观点的差异,二者的研究兴趣和理论观点也发生过变化。

安克斯密特在评价怀特时就指出过这种变化。他认为,怀特早期的《元史学》(1973年)具有某种有趣且重要的模糊性。它一方面讨论历史编撰而非历史哲学问题,另一方面又隐含了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史学理论;一方面与认识论问题毫不相干,另一方面又预示了一种新的历史再现理论;一方面提出历史书写比喻学(tropology),认为史学类似于文学,另一方面又赋予了历史知识以一定秩序,从而与康德先验的知性范畴类似。然而,怀特的观念在《形式的内容》(*The Content of the Form*, 1987年)出版后发生了明显转变,他抛弃了比喻学框架,转而思考美学上的优美与崇高。怀特抛弃修辞学或比喻学而转向崇高,倚重的概念不再是比喻(trope)而是预构(prefiguration),或是喻构(figura)。不过,崇高仍然属于康德的理性范畴,仍然与启蒙的传统相联系。安克斯密特希望寻求一种非康德、非启蒙的路径,力图在怀特的预示指引下超越怀特。^⑤

①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 40 - 49.

②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 54 - 56;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14页。

③ 安克斯密特:《答扎格林教授》,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186页。

④ Jouni-Matti Kuukkanen, *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25.

⑤ Frank 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7 - 17;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 255 - 260. Frank Ankersmit, “White’s Neo-Kantianism: Aesthetics, Ethics and Politics”, in Frank Ankersmit, Domańska, and Hans Kellner, eds., *Re-Figuring Hayden Whi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4 - 44;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99—100页。

安克斯密特对怀特前后变化的这种解读是否成立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安克斯密特《叙事逻辑》(*Narrative Logic*, 1983年)出版时,怀特已于十年前出版了与之观点相类似的《元史学》。因此,安克斯密特一直试图与怀特拉开距离,试图在批判怀特的同时为自己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贡献辩护。安克斯密特的这一解读与其说是评价怀特,不如说是投射了镜像化的自己。在彼得·艾克(Peter Icke)看来,安克斯密特的论证存在问题,没有文本证据支撑,难以令人信服,“安克斯密特在其著作中自始至终重复使用着一种特殊的论证策略,其效果就是诱导他的读者毫不怀疑地接受一种完全无法证实的假设”。^①关于比喻学消失转向崇高的问题,怀特本人明确表示过反对。^②怀特认为,安克斯密特对预构、喻构与比喻作的区分和对立也是一种误读,他未能看到预构或喻构属于比喻学行为,它们是史家赋予过去的,而非过去本身具有的、理解过去的条件。至于崇高,安克斯密特混淆了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种崇高类型。后现代主义的崇高是不可言喻的,是无法通过隐喻、语言理解和占有的,这也是怀特一直使用的含义。实际上,安克斯密特认为比喻学存在缺陷,无法处理类似大屠杀这样的极端事件,他转而使用了浪漫主义可言喻、可占有的崇高。正是通过这种混淆论证的方式,安克斯密特实现了对怀特的超越,跳出了康德先验主义的思考模式。^③

虽然安克斯密特对怀特前后变化的解读属于误读,怀特并没有抛弃比喻学而转向崇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怀特的研究兴趣和理论观点没有发生改变。确实如安克斯密特观察到的,怀特的研究兴趣在《形式的内容》出版后发生了细微变化,在《实践过去》(*The Practical Past*, 2014年)出版后又发生了第二次变化。他的理论有历史诗学风格到历史诗学,再到历史诗学功能的转变,他的观点也随之不断后退,甚至出现前后矛盾。罗伯特·多兰指出,怀特的《元史学》和《话语比喻学》(*Tropics of Discourse*, 1978年)属于“一种基于比喻的历史书写理论”,而《形式的内容》和《喻构实在主义》(*Figural Realism*, 1999年)转变为“一种历史叙事和再现理论”。^④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也指出,怀特在20世纪80年代由批判再现的激进观点后退,转而强调情节化层面。^⑤《实践过去》的出版大致可以说是怀特的第二次转变。这次怀特的观点不仅再次后退,甚至与早期观点相互矛盾。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认为,有实践过去和历史过去两种经验模式,不应以实践的标准衡量和评判历史。怀特借用了奥克肖特这一区分,虽然他强调的是实践过去,但间接承认了历史过去的存在,这显然与他早期意识形态层面的观点矛盾。^⑥

安克斯密特对怀特前后变化的解读属于误读,他将自己投射到了怀特身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解读完全没有意义,至少指明了其自身研究兴趣的前后变化。安克斯密特的《叙事逻辑》(*Narrative Logic*, 1983年)尚属于历史叙事理论,而《历史与比喻学》(*History and Tropology*, 1994年)开始转向崇高,这并不意味着他尝试探索历史经验问题,经过《历史再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① Peter Icke, *Frank Ankersmit's Lost Historical Cause*, Routledge, 2012, p. 85.

② Peter Icke, *Frank Ankersmit's Lost Historical Cause*, p. 89.

③ Peter Icke, *Frank Ankersmit's Lost Historical Cause*, pp. 88-92.

④ Robert Doran, ed.,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Hayden White*, Bloomsbury, 2013, p. 2.

⑤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65页。

⑥ 怀特所谓的历史过去,是指职业史家在坚实的历史证据基础上建立的过去。这一过去只是史家针对过去可能性的一种推测和构建,只存在于书本,它既不能解释现在也不能预测未来,不具有任何实践指导意义。实践过去是指职业史家压抑、排斥或无法处理,而历史小说却能遭遇且通过想象最终指涉过去。这一过去与日常生活的利弊相关,可有意无意地为现实的实践行动和道德判断正名。

2001年),直到《崇高的历史经验》(*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2005年),历史经验理论最终成形。他使用的理论术语也经历了由叙事实体到历史再现,再到历史经验的改变,他的观点也同样后退,出现了前后自相矛盾。埃娃·多曼斯卡指出,安克斯密特从历史叙事或历史再现转向历史经验,这种研究兴趣的变化标志着其朝向浪漫主义后退。安克斯密特虽然超越了语言学转向,但他的经验概念却没有与新的、关注日常经验的历史实践趋势结合,这种“远历史而亲哲学”的做法使他从后现代主义先锋的位置上退却。^①彼得·艾克也指出,安克斯密特从语言到经验的转变纯属一场“失败的事业”。如果说历史叙事时期的安克斯密特是“好的安克斯密特”,那么历史经验时期的安克斯密特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后退和前后矛盾。艾克认为,安克斯密特一直抱持一种获取本真过去的情怀和需要,当他的叙事实体理论无法得出认识这种过去的结论后,他陷入了一种困境,于是他决定重新讨论获取本真过去(无需语言中介)的可能路径。^②如果对过去的认识无需语言的中介,这也就等于否定了其叙事理论。

安克斯密特是在追随怀特的道路,并且在怀特的指引下进行理论探索吗?认为是这样的说法或观点可能难以成立,因为安克斯密特的历史叙事理论与怀特存在较大差异。与其说安克斯密特的作品充斥怀特的身影,不如说安克斯密特是在驱逐“怀特的幽灵”,这甚至影响到安克斯密特对怀特的解读。^③怀特与安克斯密特作为后现代主义两位代表人物,其理论差异大致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理论来源方面,怀特的理论主要来源于文学理论,他强调史学类似于文学,在模糊二者界限的同时也使历史与历史哲学逐渐趋近。安克斯密特的理论主要来源于语言哲学,他更接近哲学而非历史,甚至有意将历史哲学与历史对立,以拉开二者距离。第二,在叙事意涵方面,怀特的叙事概念更多是梳理故事线,与讲故事联系在一起,他明确不认同后现代主义的本质,不反对宏大叙事。^④安克斯密特的叙事概念与阐释联系在一起,他明确贬低对树干或树枝的研究而赞美树叶,反对宏大叙事,主张进行碎片化研究。^⑤第三,在历史运作方面,怀特在运作方向上是由历史指向过去,倾向于熟悉化运作,强调历史叙事的比喻延伸,属于相似视角;安克斯密特在运作方向上是由过去指向历史,倾向于陌生化运作,强调历史解释的自我增殖,属于差异视角。^⑥两者史学理论的差异,参见表1。

表1 怀特与安克斯密特史学理论差异表

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	怀特	安克斯密特
理论来源	文学理论	语言哲学
历史哲学与历史关系	同一	对立
针对叙事概念的理解	讲故事	阐释
针对宏大叙事的态度	不反对宏大叙事	反对宏大叙事,主张碎片化

① Ewa Domańska, “Frank Ankersmit: From Narrative to Experience”, *Rethinking History*, Vol. 13, No. 2, 2009, pp. 185 – 190.

② Peter Icke, *Frank Ankersmit's Lost Historical Cause*, pp. 102 – 103.

③ Peter Icke, *Frank Ankersmit's Lost Historical Cause*, pp. 87, 101.

④ 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1.

⑤ 安克斯密特:《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164页。

⑥ 历史运作或史学运作(Historical/Historiographical Operation)是由法国史家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提出的概念术语,具体是指广义的历史研究。塞托将历史运作划分为社会场位、历史实践与历史书写,而利科在继承这一概念的基础上,重新将其划分为档案文献、解释理解与历史再现。

续表

历史运作的视角	相似视角	差异视角
历史运作的方向	历史→过去	过去→历史
历史运作的倾向	熟悉化	陌生化

四、后现代主义的重新评价

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开启了“修辞学转向”“语言学转向”或“叙事(学)转向”,但严格来说“叙事(学)转向”可能表达的更为准确。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内部存在语言学分支与现象学分支的区别,而语言学分支,也就是后现代主义内部,又存在怀特与安克斯密特的差异。“修辞学转向”可能仅适用于怀特,而“语言学转向”这一说法,怀特本人其实不太认同,他更倾向于“话语转向”。^①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者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所谓前叙事范式学者,包括伊格尔斯、亚瑟·马维克(Arthur Marwick)、佩雷斯·扎格林(Perez Zagorin)和洛伦茨等;第二,叙事范式内部语言学分支学者,包括凯尔纳、多兰、多曼斯卡和艾克等,所谓后叙事主义学者库克楠也处于这一延长线上;第三,叙事范式内部现象学分支学者,包括利科和卡尔等。后现代主义与其批判者们(即第一和第三类)观点的分歧事实上集中于经验与历史的关系,与其说是对立与统一的视角区别,不如说是关注断裂还是连续的偏向性的差异,他们的相似性确实要比他们原意承认的更多。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从语言学转向的前提出发,通过忽视历史研究环节,最终走向了相对主义。真理问题无疑难以回避,但比喻和真理并非完全对立。正如凯尔纳所说:“对修辞学的高度敏感会表明,真理始终只是对于某个特定时刻、某个特定受众、某个特定问题和处境而言的真理。因此,对于论点、证据和事实的某一个特定的表述,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修辞上表现为真。真理是对于普遍的受众而言合理的或有说服力的东西。”^②

虽然历史最终属于语言制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诗”比“史”更真,然而,正如安克斯密特指出的,即便是小孩也能轻易地在当代史学作品与小说间作出区分。那么,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到底存在哪些区别呢?后现代主义其实或明或暗地给出过一些答案:首先,史家没有上帝视角,他写的历史只能是针对过去的一个视角或提议,而小说的作者或叙事声音是全知全能的。其次,历史是针对如何看待过去这一问题给出的提议,是积累或获取历史知识,而小说是对这种提议的应用,将一般的、已知的历史知识运用到特殊的、想象的历史情境。再次,在事实与再现的联系方式方面,历史话语是解释性的,它通过事实为过去的全面理解提供证据和说明,而小说是叙事性的,它事先获得对过去的全面理解,然后再通过具体化的写作过程将其痕迹抹去。最后,历史书写与小说相比缺乏聚焦,历史虽然看似是由一定视角出发给出看待过去的提议,但其实它只是在构建和讨论这个视角,是历史的终点(for)而非起点(from),其本质只是这一提议的一个概念或定义。换言之,历史视角是最终要抵达的论点的结论(conclusions),而非具体的论证(arguments)。小说由虚构人物的视点出发,通过引

① Peter Icke, *Frank Ankersmit's Lost Historical Cause*, pp. 92-93; Robert Doran, ed.,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Hayden White*, p. 17.

②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46页。

导组织叙事展现过去,最后就生活问题给出答案。因此,历史书写呈现碎片化趋势,可读性较差。^①当然,后现代主义这些区分是相对的,历史与虚构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更无法在“真”和指涉方面找到任何标准。那么,后现代主义的辩护与区分是否真实有效呢?就此问题而言,它的相对主义意涵确实是一以贯之的,但这种将历史叙事与历史研究、历史实在的割裂却也造成不少问题,甚至产生了诸多吊诡之处。

首先,在语言学转向理论前提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术语保证了其观点的有效性。后现代主义认为,经过日常语言的中介,经验已很难再如实地反映到史学作品,作为替代的历史再现最终属于语言制品,且在语言中展开。历史再现只有优劣而毫无对错,任何证据方面的指控或反驳对其将无法成立,因而历史再现不可证伪。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似乎也是如此。单个陈述与整体再现的原则性区分是等价的说法,完全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自我规定,是否合理仍然值得商榷。以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叙事风格为例,它同时可以被识别为隐喻、转喻、提喻或反讽,但由于这一矛盾情况,它最终只能属于反讽。因此,各种不同的历史理解和解释似乎并非如其所说是等价的。另外,既然比喻与真理不存在截然对立,那么为何作为比喻延伸的叙事或再现就不再存在对错呢?安克斯密特将叙事实体或历史再现类比为完全不可通约的莱布尼兹式单子,但如果法国史家塞托所言正确,文本的历史专名和引文可构成沟通彼此的“窗户”,这一类比就不能百分之百地成立。此外,如果历史视角只是历史论证的终点而非起点,语言学转向岂不是应该算作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结论而非前提,后现代主义岂不是陷入了某种循环论证?后现代主义似乎也就是通过构建这一转向和理论术语,然后凭借纯粹的逻辑演绎而来的,其观点的有效性早已全然包含在了其理论术语中,一切的争论也就成了术语的争论。

其次,在历史研究存在的“忽视”方面,后现代主义的辩护同样令人难以信服。语言强制也许无法完全还原为经验强制,但这并不能说明历史叙事的内容就完全由文类规则的形式决定,它同时还要受到历史研究程式的制约。如果历史研究具有仪式功能,它赋予历史以客观性,历史研究与历史叙事的关系就不应被忽视。虽然安克斯密特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纠偏性的补充而非取代,但经验强制与其说是遭到悬搁,不如说是遭到了抛弃。况且,历史研究与历史叙事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它是否能够与历史叙事观点相协调,这些不是通过一句互补就能简单解决的。安克斯密特虽不像怀特那样将历史叙事与“讲故事”联系在一起,但他却完全否定了历史的因果解释。他引用事例说明,认为原因有时晚于结果,正因为哥白尼在1543年发现了日心说作为原因,才有学者回溯查明,阿里斯坦克于公元前270年先于哥白尼发现该学说作为结果。^②这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一种诡辩。这些辩护和反驳似乎更像是为说明历史不是科学而走向的极端,而且作为复合学科的史学本身就包含不同分支,后现代主义如何能指望用以偏概全的方式来解决呢?后现代主义在遭到批判并作出回应时,强调历史书写,强调语言强制,确实有合理之处,但是,当我们认为其正确并进而向其寻求关于历史研究的解释时,它又止步不前而无法作出进一步的解答。套用安克斯密特的话说,回应的内容当然是对的,然而如果这就是全部的话,那就太令人失望了。^③

①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02—104页;安克斯密特:《叙述逻辑》,田平、原理译,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7页。

② 安克斯密特:《答扎格林教授》,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195页。

③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03页。

最后,在相对主义方面,后现代主义并非我们唯一的选择。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同的历史解释是等价的,在其看来,似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后现代主义。正如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和洛伦茨强调的,历史的原义自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以来就是探究,其目的和任务就是求真,^①对史学理论的反思难道真的可以局限在思辨层面,与它的实践完全脱节而丝毫不考虑其学科独特性吗?后现代主义的叙事并非传统的叙事,因此,后现代主义并非叙事的复兴而是叙事的转向。如果历史叙事是对过去经验的组织,那么关键问题就不是历史是否指涉,而是为何指涉或不指涉经验及实在。后现代主义用“相关”代替“指涉”更多是出于一种言辞策略,对历史指涉性的否定令人难以信服。怀特在面对“大屠杀挑战”时提出了不及物书写(intransitive writing)和中性语态(middle voice)概念,但这两个概念在历史书写中能否付诸实施仍是个问题,他坚持的相对主义能否实现其认为的学术宽容也是个问题。正如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指出的,这一主张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站不住脚,如果差异和质疑没有与“真”联系在一起,就无任何宽容可言。^②安克斯密特在后期认为,通过不及物书写和中性语态,可以经验获取未被“中介”的过去实在,^③这岂不是与其前期观点相矛盾,或转向了他批评的连续性视角?这岂不是等于承认语言对经验或过去实在的驯化并不如其之前设想的那样成功?后现代主义两位代表人物的观点在转变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自相矛盾,更确切地说,均存在一定的后退。因此,正如他们的批判者呼吁的,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理论,该理论需要以历史叙事或再现的“真”为前提,并与历史研究更相契合。现象学叙事实在论正好就是这样的理论,但我们目前对它的关注和研究明显不足。

(作者成威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讲师;邮编:200234)

(责任编辑:崔瑾)

(责任校对:张舰戈)

① Arnaldo Momigliano, “The Rhetoric of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Rhetoric: On Hayden White’s Tropes”, *Comparative Criticism: A Yearbook*,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60; Chris Lorenz, “Can Histories Be True? Narrativism, Positivism, and the ‘Metaphorical Turn’”, p. 329; 克里斯·洛伦茨:《跨界:历史与哲学之间》,第109页。

② 卡洛·金兹伯格:《只有一个证人:对犹太人的灭绝与真实性原则》,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106—107页。

③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11—117页。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the 1960s through the efforts of scholars like Terence Ranger. This school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historiography by deepening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African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further expanding its methodology, and establishing a system for training historical talents. By the 1970s, its guiding ideology gradually shifted towards dependency theory and Marxism, and its members launched the intense criticism of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This school entered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by the late 1980s, making further breakthroughs in historical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The range of topics it addressed significantly expanded, and academic exchange platforms improved. While this school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t has also been widely controversial, mainly due to its excessive focus on ideology, lack of original guiding ideas and its failure to fully guide historical practice with academic ideas. The Dar es Salaam School is a microcosm of African historiography. How to realize the revival of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a historical issue that deserves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Africa.

From the “Racial Narrative” to the “Atlantic Turn”: The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Haitian Revolution Studies // Ma Weijun

The Haitian Revolution has transformed the Atlantic world, and its history remains a hot topic among scholars today. The study about this historical event has undergone a shift from the “racial narrative” through the “class narrative” to the “Atlantic turn”. The “racial narrative” emphasizes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hip role of the mulattoes and black elites, ignoring the role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slaves. It argues that the revolution could not have succeeded without the leadership of free people of color. The “class narrative” highlights class conflict, believing that the revolution was a class issue rather than a racial one. It transitions from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black Jacobins to that of the vast slaves. The “Atlantic turn” places importance on the “Atlantic factors” in the revolution’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impact, believing that the Haitian Revolution, like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Atlantic world. In this context, the stud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ranch of Atlantic history and has even formed an independent field of study. This shift is the result of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the ti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within the wider context of evolution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t has revitalized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both the Haitian Revolutio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thinking Postmodernist Historical Theories // Cheng Weihua

Postmodernist historical theories focus on historical writing, believing that the historical text is a form of verbal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can be neither true nor false. This point of view has been fiercely criticized by scholars. After introducing these criticisms and post-modernist scholars’ self-defense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and investigates theoretical shift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views of two representatives, Hayden White and Frank Ankersmit. By doing so, it reappraises postmodernist views. To be more specific, there are some shift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White’s and Ankersmit’s views, which have made distinctions to some extent between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fictional narratives. Yet, both of them have overlooked the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process and rejected the possibility of “true” historical narratives. As a result, they fell into the traps of historical relativism and their views may even have become self-contradictory. Compared to postmodernist narrative idealism, scholars today need a narrative realism, which is more suitable to historical research.